

學林

◀ (上接5版)

另外，辛从益认为云集于上海的海船主要从事洋货贸易的说法也并不全面。事实上，从乾隆后期至嘉庆初，受益于太仓浏河港淤塞等原因，上海正逐渐取代稍北的浏河，成为南北洋贸易中心，发展成了全国最大的棉布和饼豆市场，东北豆货南来，江南棉布北往成为一种常态，大量的沙船因此而集聚于上海，正是这些适合航行于北洋的沙船后来成为了漕粮海运的主力，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上海士民将黄道婆视为“海运功臣”并不为过。

还值得注意的是，道光六年前后，江南漕粮征收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浮收”问题，苏州、松江一带征收一石漕粮往往会多收四五斗，甚至六七斗，作为漕粮运输的补贴，由此引起地方士人的反弹，发生所谓“告漕”“闹漕”事件，被地方官府弹压。针对类似事件，辛从益作为学政，认为应该约束地方官员的权力，维护士子利益，因此与主张严惩的江苏巡抚陶澍产生龃龉。而黄道婆的请祀得到了陶澍的大力支持，所以辛从益的阻挠也不排除存在某种意气之争。

黃道婆入祀推動者

《募建黃婆祠疏》最有价值的地方还在于让我们得以确认了道光六年推动黄道婆进入祀典者究竟有哪些人。因为毛岳生在道光十年的《上海县黄婆祠记》中曾经提及，道光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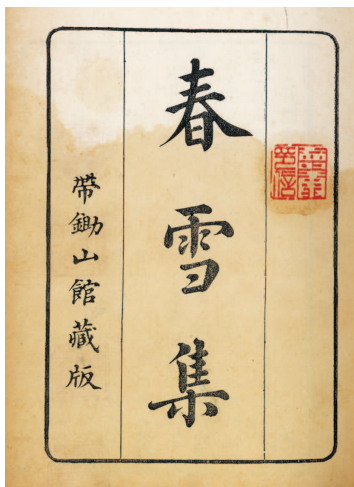
最初上书推动黄道婆入祀者有十四人，其姓名均载于碑阴。但由于历年久远，碑碣无存，因此关于这些人的姓名和身份，至今无从查考。

而根据《募建黄婆祠疏》的记载，当时联名具禀者分别为“户部员外郎李林松、刑部主事张惇训、光禄寺典簿李筠嘉、太常寺博士李钟元、都察院经历毛振勋、贡生候选教谕瞿应绍、诏举孝廉方正举人杨城书、布政司经历李心泰、布政司经历朱增慎、布政司经历王揆、廩生莫树培、廩生郁松年、监生徐渭仁、生员陈瓚”等十四人。

以上十四人中除陈瓚外，其余生平事迹大致可考，通过考察这些人的身份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黄道婆请祀的背景，更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当时的上海城市社会特质。

总体而言，这些联名具禀者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比较典型的地方士绅，包括李林松、张惇训、瞿应绍、杨城书、莫树培、徐渭仁、王揆等。这些人大多出身正途，有着进士、举人或者国子生的身份，但同时对于当时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有着敏锐的见解和较深的介入。比如李林松为乾隆六十年进士，嘉庆《上海县志》主纂，他在道光六年以前就曾经向苏松太粮道汤藩提出了雇募沙船，推行漕粮海运的建议。再如王揆本为国子生，但却“熟悉洋情”，在道光六年的海运中出力尤多，事后得到了陶澍的大力赞赏。

第二类是出身于商人家庭的地方士绅，包括李筠嘉、李钟元、李心泰等。其中李心泰曾祖



李筠嘉《春雪集》书影

李长禄、祖父李士达均为商人，“为贾楚越间，家日以饶”，李钟元曾祖李泓也曾在苏州阊门一带经商，李筠嘉则是清代上海著名的藏书家，其先世也同样经营商业，所以累积了很多资产，能够供他搜罗珍本秘笈。考虑到明清时期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他们先人所从事的很可能就是棉布贸易。比如与李筠嘉等同时代的褚华在《木棉谱》中就曾提到其家族从六世祖开始便从事棉布贸易，“秦晋布商皆主于家”，“其利甚厚”，由此富甲一方，或可以为佐证。

第三类则是直接从事棉布贸易的海商、沙船商，其代表者为毛振勋、朱增慎和郁松年。陶澍在道光六年海运事竣后的上疏中特别提到了毛振勋和朱增慎二人，指出他们在海运之初便“将自置沙船承运米二万余石，并将应领水脚银八千余两捐出充公”，因此对其大加赞赏。而朱增慎和郁松年本人便出身于嘉道间上海著名的船商家族，其中朱家开设沙船商号“朱和盛”，有“朱半天”之称，郁家开设“郁森盛”号，当时民间谣谚称郁家为上海“城中首富”，“多号多船又多屋”。

可见，这些人都与道光六年的漕粮海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他们之间在平时就以各种形式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比如李林松主纂嘉庆《上海县志》时，便曾邀请张惇训、莫树培、徐渭仁、李筠嘉、李心泰等人参与编纂。此外，他们还通过诗酒文会来维持相互之间的联系，当时上海县城内由李筠嘉所修筑的吾园在嘉道间便是此类活动的中心之一。由李氏主编的《春雪集》一书汇集了上海地方士绅在吾园内集会时的诗歌唱和之作，其中便包括了李林松、瞿应绍、莫树培、郁松年等人的诗作。所以，后来在道光六年以吾园之半辟为黄道婆祠



←包世臣像



→陶澍像

并不是偶然的，而他们将黄道婆视为“海运功臣”，进而联名请求将其列入祀典的申文或者也曾经在这个园子里进行过商拟，也是可以想见的。

上海地方紳、商的分流

更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这样一个以地方士绅和商人为主的社会群体事实上在当时的上海地方社会运行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嘉庆二十五年，朝廷疏浚吴淞江，由各地县令甄选地方人士担任董事，负责相关事务，当时上海县有董事四人，分别为陈焕、李心泰、李筠嘉和朱增慎，后三者的身份上文已有所考释，而陈焕同样也是当时上海县内著名的商人，并乐为善举。

此外，嘉道间上海城内最为重要的一些慈善机构也和这一群体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李心泰的祖父李士达便是上海育婴堂的创建者之一，而李心泰本人则参与了另一个慈善机构——同仁堂的创建。根据道光十一年《上海同仁堂征信录》记载，当时李心泰和陈焕任该堂司总，瞿应绍负责瞻给老人，郁松年负责施棺，与朱增慎为同族的朱增沂和朱增惠亦分别执掌义冢和瞻给老人之事。

直至道光二十二年，英军逼近上海县城时，上海县令刘

光斗与城内绅商计议守城策略，据时人乔重禧在《夷难日记》中记载，当时参与商议的有上海城内所谓大董八人，分别为瞿应绍、曹洪集、金树涛、沈希辙、朱增慎、朱增惠、郁松年和徐渭仁等。

可见，鸦片战争前，地方士绅和沙船商人在某种程度上共同主导着上海城市社会的发展，这种新型的绅、商结合的方式跟传统时代迥然有别，也是当时整体社会风气转变的突出表现。

根据有关学者的统计，清代松江、上海地区科举状况逊于周边，何炳棣先生认为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乾嘉以后，随着上海成为全国最大港口，大部分人力资源都被转投入了经济领域。即使是那些曾经金榜题名者，也纷纷弃古文而趋经济，比如那位领衔禀请黄道婆列入官方祀典的李林松，在其晚年便认为八股时文乃至古文、经学皆不足言，“学者终当求实用也”，这样的认识应该是绅、商逐渐合流的思想基础。

当然，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还是乾嘉以降上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以沙船为媒介的棉布贸易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这一过程中，黄道婆作为一个信仰符号，或许可以被视为能够将不同的绅、商群体联合在一起的粘剂。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郁松年船图